

中还不规范，使得在误差之外还增加了人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信度。另一方面，不少社会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和统计理论还比较生疏，导致对许多数据的分析流于表面，无形中浪费了宝贵资源。近几年来，在国际社会学界的资助下，国内已举办过三次高级统计方法班，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向大陆同行介绍社会科学统计方法，这有助于帮助国内学者缩小在方法上的差距。笔者在此还想提出的是，与美国、欧洲的社会学界相比，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尚未建立起资源共享的公共数据库，以推动定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实践。这也是未来几年内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切实从实际出发 建设好中国的社会学

谢遐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费老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五届潘光旦纪念讲座的上和在吴江宾馆举行的 90 大寿庆祝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过回顾和体会》，是一篇重要文献。这篇文章回顾了费老领导重建社会学学科的二十年，指出我国社会学界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文章涉及内容广阔，不少问题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领会。如文中说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有个大问题，就是“把人只当客观事物来处理还不够”，只觉得十分重要，非常正确，但欲说其详，就不太说得清楚，感到还要学习、体会。所以，这里仅就两个感触较深的问题谈点体会。

第一问题，就是要补课。费老在文章中反复叮咛，不厌其详，可见其重要。“补课”本来是邓小平同志针对要重建社会学学科说的，但二十年后的现在有了新的意义。费老指出，研究社会学的教师们也须补课。我本人的体会是，今日中国的社会学远远没有成为“显学”，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其认识和影响社会的功能。之所以社会学在我国尚未成为显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社会学有个了解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学研究者自己功夫不到。大量问题还没有研究明白。例如费老举出的，中国特点具体表现怎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就需要我们经过艰苦研究而后把它讲清楚。

社会学本来就是年轻的学科，传入中国时间不长，又中断了二十多年，空白面很大，要做的工作很多，困难大，余地也很大，很有前途。许多理论对我们国家的建设直接有参考价值，但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却无动于衷，因为还没有真正理解，没有弄懂。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从未存在过。同样，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这一理论中的关键词“理性”应作何理解，至今不清楚。因而作了大量调查，却忽视了不少重要变量，已经收集到的数据也未能看出其意义。理论不清楚，实证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调查工作呈现盲目性。

费老要求把中国特点是什么讲清楚，我的理解，是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住中国社会。不是这里戳一枪、那里戳一枪，而是要求有个总体的把握、并且必须是搞清具体表现的基础上有总体把握。对比这一要求，我深感自己距离很大，须加紧努力赶上。



第二个问题是，一定要坚持社会学的实证原则，切实地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创造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我体会，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费老指出，“我们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少，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准确、深刻地提醒我们要丝毫不懈怠地努力。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对中国社会很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故此不可避免地会走很多弯路。社会学承担着沉重的使命，要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要贯彻社会学的实证原则于各门社会科学，真正切实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才能为我们祖国做出贡献。不坚持实证研究，凭想象提出各种主张，会损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实证原则之重要性超出社会学学科，而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它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原理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具体表现。总的精神是实事求是。回顾我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历程，深深感到偏离实事求是原理的力量是何等地大！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偏离实事求是原理，都是没有真正从实际出发。我感到，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雷洁琼、家师徐雍舜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一直坚持的实证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夸夸其谈的空疏作风盛行。或许，时“左”时右在学风方面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实证精神。“空谈误国”非虚言也！

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论十分重要。费老指出，中国的社会研究早先没有把人作为客观对象看待，到五四时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才有了新局面。而社会学自引进之初就提倡“本土化”、“中国化”。费老说，“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既要科学化，又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费老认为，第一条要坚持的仍然是五四时期引进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性。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时至今日，科学地、单纯把社会当作客观事物研究的路数是不足的。这里不仅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费老把问题提得更广阔，认为这是“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问题”，指出了其普遍意义。这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要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土壤，理性主义思路恐怕是不够的。费老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谈到叩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之道。联系到费老复旦大学潘光旦纪念讲座致辞时讲到的潘光旦先生的“位育”概念。那个概念在用语上源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今天仍然行之有效。这就说明中国社会的研究，单用理性主义思路不够的，费老既认为，第一要坚持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性，又认为要注意另外一面（我体会就是单用理性主义科学作风不够），很全面地阐明了今后中国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应注意的倾向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处辉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及问题的看法

如果从康有为 1891 年在广州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之教学大纲中始有“群学”作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开始时间，中国社会学至今已有 108 年历史；如果从第一本社会学著作在中国出版，即 1902 年章太炎所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在中国出版算起，也已有 97 年的历史（严氏译

